

青铜器及青铜文化：

中华文明重要的

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



◀西周大孟青铜鼎。



◀商龙虎纹青铜尊。



▲商王武丁时期“妇好”青铜方罍。



◀春秋时期“蔡侯申”青铜方壶。

“青铜时代”这个词，最初是由丹麦考古学家G·J·汤姆森（1788-1865）提出的。他在1816年被任命为丹麦国家博物馆首席馆长后，为了陈列藏品，将馆藏武器与工具按制作材料进行分类，并依照材料划分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个相互衔接的时代。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说明“青铜时代是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时代”。近数十年来，我国考古学所采用的青铜时代之概念，也强调青铜器在社会物质文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国国内曾在近公元前3000年的马家窑文化晚期房址中发现一件青铜刀，但现在没有资料证明当时已普遍使用青铜器。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即约始于前18世纪，终于前5世纪中叶至4世纪中叶，也就是战国早期。中国青铜时代之结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一样，是由于铁器被广泛使用，取代了青铜在社会物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青铜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青铜器不再使用，如礼器一直到汉代仍主要由青铜制造，兵器一直到秦代仍有不少是青铜制造的。

值得注意的是，青铜武器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正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存在的时间相应，故学者们相信，在中国，大量青铜武器的出现亦意味着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的建立。这说明在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不仅作用于社会物质文化发展，亦对社会政治生活造成直接而巨大的影响。

西汉蟾蜍玉兔纹瓦当

现藏陕西省淳化县博物馆的西汉蟾蜍玉兔纹瓦当，是国家一级文物，咸阳市淳化县西汉甘泉宫遗址出土。瓦当面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浮雕着一只疾奔的小兔，两前足跃起，双耳后竖，羽毛向后飘飞，尾巴上翘；下半部是一只起跳的蟾蜍，圆目凸起，大腹鼓圆，舌长伸，生动传神，极富生活情趣。

西汉蟾蜍玉兔纹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屋檐檐端的瓦片，属于建筑构件，是秦汉时期房屋建筑中的重要装饰物。瓦当上一般会雕刻有动物、植物、人物等图案，用以表示房屋主人的身份或者地位，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信仰和民间风俗。西汉蟾蜍玉兔纹瓦当的图案设计精巧，线条流畅，刻画生动，制作考究。其中蟾蜍和玉兔的造型更是栩栩如生，富有情趣。蟾蜍和玉兔的图案在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形象在古代建筑中经常出现。

蟾蜍代表着财富和幸福。因为月亮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是团圆和爱情的象征。因此，蟾蜍瓦当的图案也寓意着团圆和幸福。

玉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是神兽，代表着纯洁和温柔。玉兔瓦当的图案也寓意着家庭团圆美满。

在汉代，蟾蜍玉兔瓦当并不是随意设计的，而是经过精心构思和巧妙安排的。玉兔与蟾蜍相互追逐的图案设计，不仅增加了瓦当的趣味性，也寓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同时，这种设计也体现了汉代建筑装饰的艺术风格和特点，表现了当时人们对建筑美学的追求和对生活情趣的关注。

除了在设计上的应用，汉代蟾蜍玉兔瓦当还具有文物价值和文化意义。作为秦汉时期瓦当发展的高峰时期代表作品之一，它不仅见证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和演变，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信仰和民间风俗。

在另一方面，汉代蟾蜍玉兔瓦当的制作工艺也值得一提。当时的制作技术已经非常精湛，采用范模制作，画面构图巧妙，线条流畅，刻画精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意义。

（据《联谊报》）

遂公盨·祭祀禹王

这件约2900年前铸造的青铜器名为遂公盨，它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献记录，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现藏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遂公盨呈椭圆形，直口、圈足、腹微鼓，兽首双耳，盨盖缺失。口沿饰分尾鸟纹，器腹饰瓦纹，小耳上有兽首，圈足中间有桃形缺口。

遂公盨内底有铭文10行98字。铭文记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用堵塞洪水和疏导河流的方法平息水患；划定九州，根据各地土地条件规定各自的责任。洪水退后，逃难到丘陵山岗上的民众下山，重新定居于平原。铭文书法秀美，整齐匀称，以大段文字阐述德与德政，教诲民众以德行事。

遂公盨的铭文和常见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很不一样，既没有开头的历日，也没有末尾的套话，因此乍看起来似乎不是全篇。其实盨铭首尾一贯，别成一格，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最突出的一点是与《诗》《书》等传世文献有密切的联系，铭文前面讲禹的一段，尤其是如此。

盨是用来盛黍稷的礼器，从簋变化而来，西周中期偏晚的时候开始流行。遂公盨这种形制，在盨的序列中是较早的。分尾鸟纹的特点属于西周中期后段，即周孝王、夷王前后。此前，关于大禹治水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战国时期。长期以来一直有关于禹和夏朝是否存在的争议，个别外国学者甚至怀疑中

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遂公盨铭的发现，将有关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一下子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也最为翔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充分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在广泛传颂着大禹的功绩。

2002年春天，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遂公盨。上面的铭文将有关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最翔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充分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在广泛传颂着大禹的功绩。大禹依靠艰苦奋斗、因势利导、科学治水、以人为本的理念，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取得治水的胜利。由此形成以公而忘私、民族至上、民为邦本、科学创新等为内涵的大禹治水精神。这一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据《内蒙古日报》）



清代解元书法七言联



此副书法七言联为清嘉庆三年解元张廷济所书，释文为“仍来闻酒敲诗地，又值华明柳媚天。”

据介绍，张廷济为清代书法名家，其运笔刚劲坚挺，点画如屈铁坠石，一反康熙、乾隆时期以来占据主流的赵、董柔美书风，独具阳刚雄健之美。（据《侨乡科技报》）

东汉连枝灯



年代：东汉。
质地：陶。
规格：高48厘米。
特点：连枝灯是一种立灯，又称多枝灯、树形灯。文中连枝灯1992年出土于大同市阳高县古城镇安家皂乡。灯由座、柱、盘、盏四部分组成。灯盏为圆底盘形，灯柱为圆体竹节形，由下至上逐步减细，灯柱上部分由灯枝及龙首顶灯相间环绕。龙首由上至下共7个托盘，顶层1个，中层3个，底层3个，中层托盘与底层托盘位置相错。灯盘为浅盘宽平沿，沿上相间堆塑龙顶托盘、鸟落树头、立人等塑像。据考证，这种鸟为凤鸟，象征太阳、光明，塑在灯上有“长明”的寓意。

渊源：汉代是灯具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其种类之繁多、构思之新巧、数量之庞大，均超越前代。汉代灯具既是战国和秦朝灯具的继承，又有时代创新。这个时期，各种造型独特的灯具异彩纷呈，有器皿形灯、动物形灯、人物形灯等。其中连枝灯做工精巧，造型独特，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连枝灯出现于战国，盛行于汉代，以铜质、陶质最常见。铜质连枝灯的形体较高大，常在1米左右，下有灯座撑托树干式的灯柱，灯盏则少则3个，多则依次递增，一般为豪门大户的照明用具。

这件造型精美的陶连枝灯作为汉代表器物之一，反映了汉代开放包容的文化风貌和高超的制陶技术，不仅具有实用功能，还体现了古人的审美追求，负载了古人的思想和精神寄托，为我们了解汉代灯具提供了很好的实物例证。（据《内蒙古日报》）

犀牛望月铜镜架



这件明代犀牛望月铜镜架现收藏于观复博物馆。它以红铜为材质，制作精美，刻画精细。独角犀牛双目圆睁，跪膝趴匍，呈回首望月状。犀牛体态健硕，肌肉强劲，形态生动，背上高衬祥云，托起一个弯月形的用来搁铜镜的部件，中有空槽。将铜镜插入空槽，可以稳稳地靠在弯月形部件上，犀牛便呈望月状。

犀牛望月镜架通常有2种，一种是如文中有空槽的，槽中插入铜镜，供妇女使用。另一种是没空槽的，虽然是镜架，但更是装饰品，常被男主人用来当作镇纸之用。（据《内蒙古日报》）